

A15

評論

大公報

2022年12月20日
星期二

責任編輯：曹宗興

議事
論事

王西銘

美國國務院日前宣布，成立一個新的針對中國的部門「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而過去一年多來，美當局已經成立了四個與中國有關的機構，再加上原本已經存在的兩個，換言之，目前已經有最少七個「中國小組」。「中國小組」氾濫，除了說明美國當局過華的意圖外，實際上也是在反映出美國對華的嚴重焦慮和極度心虛。這樣的心態不僅無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反而是在增加對華政策的混亂程度。但對於香港來說，這些機構幾乎都涉及香港，因此除了要警惕美當局的極端舉措外，也要加強對美國涉華涉港機構及政策的研究，以把握主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12月16日為這一

被稱作是「中國小組」（China House）的新部門剪綵，該部門取代原先美國務院東亞局下的「中國科」（China Desk）。原本「中國科」已經是美國務院內最大的單一部門，新機構人數大幅增加達到近70人，結合國務院內外的中國專家和國務院各區域局處，跟橫跨國際安全、經濟、科技、多邊外交與戰略溝通的專家密切合作。

成立這個機構的真正意圖為何？表面上的說詞必定是冠冕堂皇，布林肯在致辭中稱，「中國小組」將強化溝通協同合作，以統合和強化對中國的政策，定出政策優先次序。並說，「中國小組」將確保美國政府能夠負責任地管理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並推進我們對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云云。

顯而易見，這不是一個着眼於構建健康美中關係的部門，而是意圖強化美國當局對華遏制政策的機構。美國媒體Politico報道指出，該新部門有三個主要團隊，分別是「傳統雙邊事務」、「戰略溝通」以

及「中國海外活動」。有媒體引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新的架構將使每個地區機構及其合作的國家與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高級官員建立直接聯繫。也就是說，不僅涉及美國國內政策，還將涵蓋所有美國外交事務。

新部門的成立其實並不令人意外，過去一年多來，類似針對中國的機構已經不斷出現。

去年3月1日，美國國防部（DOD）啟動「中國特別工作組」（China Task Force）；去年10月，美國中情局（CIA）成立「中國任務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今年11月29日，美國國防情報局（DIA）宣布組建「中國任務小組」（China Mission Group）；今年12月8日，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宣布成立「中國委員會」（China Select Committee）。如果再加上已有的「國會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等，相關涉華機構已多達七個，這還不算美國政府各部門內部的對華

部門。

如此多的涉華機構，充分說明美國當局對華政策的極度焦慮。既要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又憂慮過度的「妖魔化」所產生的嚴重對立不符美國利益；既要保持對華的必要溝通和合作，又擔心無法達到對華的有效遏制；既要全面整合政府部門以集結力量對付中國，又想避免出現所謂的「新冷戰」。美國這些焦慮的另一面是心虛，以為成立新組織、增加人員、整合資源就能有效應對中國挑戰，實際上是在令對華決策機構更加臃腫，反而增加決策的不可靠性。

事實上，設立新的針對中國的組織，負面效果已經顯現。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2月23日，美國司法部就宣布終止「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主要原因是：「認為它不公平地將美籍以及旅居美國的華人描繪為不忠誠。」有此前科，難保其他「中國小組」不會重蹈覆轍。

當然，美國對華機構再多，其最核心的決策機構仍然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其過華政策方向不會改變，未來政策推進或許會有快有慢、有多有少，但不可能出現重大轉向。

美國當局對華機構的調整，對於香港各界而言並非與己無關，事實上，幾乎所有這些「中國小組」無一例外都會涉及香港，而以往相關機構的年度報告，也無一例外會極力攻擊抹黑香港。上月17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的所謂「二零二二年報告」，對香港特區作出惡意詆毀和政治攻擊，特區政府立即作出了批駁。這種批駁十分必要，但仍然需要對美當局政策更加深入及全面的把握，包括清晰掌握情況、了解政策意圖、評估風險和作出應對準備。

長期以來，香港都缺乏對外關係方面的深入研究，不僅是特區政府內部缺乏，香港各所大學或研究機構也非常欠缺。在新情況下，不論從哪個角度而言，未來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在被動中把握主動。

智庫研究員

做好疫情風險管控 爭取早日實現通關



有話
要說 陳正寧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公布防疫「新十條」，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工作後，特區政府日前亦因應香港的疫情變化調整防疫措施，市民不再需要掃「安心出行」，但進入食肆等指定處所仍要出示「疫苗通行證」；取消「黃碼」，確診者為「紅碼」，非確診者一律為「藍碼」；內地及澳門來港旅客的「檢測待行」安排亦取消。這是貫徹「精準抗疫」的再次適切調整，香港與內地防疫標準已逐漸接近，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加快復常。

內地在科學精準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持續推動優化防疫措施，減少防疫措施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全力推進經濟民生復常，這對於香港而言，是重大利好。香港亦應積極作為，把握契機與內地聯合加強精準防疫和推進防疫指標及機制的對接，為兩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

筆者認為，隨著聖誕節和新年臨近，香港復常步伐還可再邁出大步，在考慮數據和評估風險後，繼續優化防疫措施，例如優化入境旅客快測安排，促進旅遊消費及有助吸引海外旅客來港。投資銀行高盛指出，隨着內地取消防疫限制並重啟經濟，將推高對進口和海外旅遊的需求，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有望提振7.6%，是區內最大受益者。若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所引來的「活水」必然有助香港經濟強勢反彈，實現多贏局面。

是次內地優化防疫措施是以科學精準防控出發點，絕非一些人口中的「躺平」，而是邊防控、邊研究、邊總結、邊調整，走小步、不停步，不斷優化完

善防控措施，是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群眾生產生活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內地防疫政策不斷優化，將對香港和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帶來希望。

受疫情影響，兩地實施有限度通關接近三年，嚴重影響了香港經濟以及兩地居民往來。兩地防疫措施現正在「同向而行」，比如同樣主張「精準抗疫」。兩地要恢復正常通關，最重要是確保香港放寬檢疫措施的同時，不會額外增加內地防疫風險，要與內地聯防聯控，聯合精準防疫，共同建立兩地統一的防疫標準，做好風險管控，唯有這樣兩地正常通關才可以早日實現，香港經濟才能加速復甦。

內地第三季的經濟增長率為3.9%，高於預期的3.3%，經濟恢復好轉明顯優於第二季。對於現時經濟表現疲弱、復甦速度緩慢的香港，恢復對外通關、恢復國際往來顯然不是加速經濟復甦的「靈丹妙藥」，只有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加速人流、物流、資金流的流動，才能有效地帶動零售和相關行業的復甦，刺激企業投資信心回升和市民消費信心回歸，更是加快經濟復甦的關鍵所在。

內地近期持續優化防疫措施，不少外媒和國際金融界人士均看好優化防疫措施後的中國經濟，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市率先上漲，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斷增強。

兩地民眾對通關可謂是望穿秋水，翹首以盼。隨着內地實施防疫新措施，不斷優化防控措施，持續科學精準防疫，兩地有望加快恢復通關進程。內地的經濟增長也將重新加速，有利兩地人員、經貿恢復密切往來，為香港重振經濟、社會復常增添強大動力。

醫生、香江聚賢衛生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改革地區行政 助政府施政落地



議論
風生 胡恩威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指出，現屆區議會任期將於明年年底完結，他已要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為地方行政檢討並作出建議，以提升基層治理效能。並在十八區設立「關愛隊」，凝聚各界力量建設好社區。但在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中沒有提及地區行政改革的時間表或具體指標，果果政府要做到良政善治，加強地區行政，是一個重要方向。

行政長官提出設立的「關愛隊」，其性質基本上類似社會福利署的外展隊，可以達到某種改善社會民生的功能，但從優化地方管治，例如改善交通問題、衛生問題、居住環境問題，或許需要一個革新、一個賦予地方實質行政權力的行政架構。

回歸之前，地區市政事務的決策權由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負責，執行權交給政府部門市政總署。1999年，特區政府解散兩個市政局，將市政事務轉交食物環境衛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而區議會僅繼承其諮詢權和撥款權，並無決策權。

可適當增加區議會權力

筆者認為，區議會最大的問題是它只屬諮詢性質，未有實質的地方管治權力。香港的區議員只是擔當諮詢角色，那麼誰人掌有地區實權呢？就是由民政事務總署設立的十八位民政事務專員。民政事務專員的職能是直接監督地方行政計劃在區內的運作、確保當局適當地跟進區議會所作出的建議，及透過部門之間的磋商及合作迅速解決地區問題。

然而，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民政事務專員和區議員有否發揮其應有功能，組織和統籌有效的防疫措施工作呢？明顯地，地方行政有更新改革的需要，那麼如何改？怎樣改呢？區議會沒有掌握地方實權，區議會設立的各個委員會都

是提供意見或者評論現況，其實只是坐長一種批評文化。所以筆者對地方行政改革提出五項建議：

第一，未來可適當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實質權力。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有一個好處，就是培育政治人才，區議員先由地方議政開始，繼而培育參政議事能力。若果組成地區行政人才庫，可以為政務官管治模式之外，提供另一個後備人才團隊。

第二，是否需要委任「區長」？現時地區民政事務專員的職級是首長級丙級政務官。但這級別未必能指揮到其他政府部門，是否應該重新構思，例如是否選派一位更高級別的政務官去負責？還是行政長官直接政治任命？是需要政治問責的。又或者再賦權區議會主席，並委派一位常任秘書長協助？

另一方面，將來區議會的頂層建築及設計，應該保留十八區？還是重組？增加或減少行政區數目？可能性很多，是值得研究的。此外，現在每個區議會都設有委員會，就當區的事務與社區問題提出意見和協助。但各區的委員會數目不一，即是說區議會沒有建立一個健全的運行機制，委員會應該涉獵什麼範圍？數量應該多少？這些都是檢討區議會頂層建築的時候需要注意。

第三，政府若修改《區議會條例》，應研究可賦予區議會有什麼決策權？權力範圍是否包括房屋、醫療、教育、衛生等？甚至是借鑒內地模式發展地區經濟又是否可行呢？特區政府和地方行政之間如何取得權力的平衡？這都需詳細規劃。

第四，政府部門應該如何去配合地區？目前警務處、消防處、醫管局、渠務署等的工作分區，都不是按十八區劃分。教育局是根據十八區設立校網，食環署和康文署就十八區設立辦事處。其他政府部門是否應該根據地方行政區的分布而設立工作分區，以加強與各區的聯繫？

第五，每區須協調均衡發展，現在各區人口資源不一，香港是否可以「多中心發展」，在地區造更多就業機會，減少居民跨區上班，減輕交通運輸負

荷呢？另外，各區可實驗單車城市的概念，鼓勵綠色交通或者步行。例如將軍澳區是一個很好的試點，或者未來北部都會區的規劃，都可作綠色交通試點。

若果地方行政做得好，區與區之間產生良性競爭，製造更多投資機會。每一區有不同的特色和資源，有些是商業區、有些是娛樂區、有些擁有旅遊資源。現在行政長官要招商，就各區特色吸引商機。以香港豐富的資源財力，地方行政做得好便能活化地區、發揮地區潛力。例如黃大仙區有很多廟宇，佛教、道教很多傳統文化資產，又例如中上環區，除了是金融區之外，亦是美食區、海味區、酒吧區，可否仿效京都「錦市場」增設美食市場呢？其實每一區都可以發展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經濟特色，不一定要一體化呢！

強化地區行政統籌能力

現在市政工作交由康文署和食環署負責，食環署雖是一個大型政府部門，現有大量員工，但市政工作仍有待改善。在規劃層面上，地方行政很重要，優化社區需要設立一位「區長」。現時很多政府政策如何「落地」呢？例如交通運輸政策、垃圾分類、將來的垃圾收費政策，如果沒有一個地方行政去配合，就會出現政策不能落實的問題。

各區都面對一些經濟民生的問題，如果有一位「區長」，他有一個具體的角色責任要背負，就會主動去協助和解決問題，而並非只是透過現有機制去處理，這樣不單效率較低，而且政府和市民之間會製造許多誤解和隔膜。若果有一位「區長」去解決民生問題，拆除一些行政程序關卡，相信香港人的幸福感會加強。

行政長官承諾未來幾年要搞好民生議題，達至良政善治。但若果地方行政未能做到政通人和，施政將會出現很大的結構性隱憂。期望特區政府早日完成地方行政檢討工作，並能夠參考借鑒過往經驗，結合區議會的優點，發展一套新的地方行政體制。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谷歌拒糾正搜尋結果背後的「雙標」



焦點
評論 吳志斌

自11月份以來，港隊參加國際體育賽事時，屢次發生主辦方播錯國歌事件，主辦方「誤」將與黑暴有密切關係的歌曲當作中國國歌公開播放。最近一次發生類似的事件是在12月2日，在迪拜舉行的「2022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中，香港運動員連煒楨在女子「所有年齡組別及體重級別47公斤」賽事中奪得金牌，在頒獎禮上播放國歌時，大會竟播放有關歌曲，連煒楨隨即打出「T」字暫停手勢，示意不滿，約一分鐘後主辦方才改播正確的中國國歌，但當播放正確國歌時，初段幾個節拍一度甩音，播了全首後，又重複播一次，再把音量收細，最後突把中國國歌腰斬，連煒楨隨後轉身下台。

因應港隊出戰國際體育賽事接連發生國歌、區旗出錯事件，港協暨奧委會已具體地推出「關於運動員參與國際體育賽事

期間處理播放國歌和升掛區旗」的指引和要求，與此同時還與82個體育總會簡介應對同類事件的正确回應，指引列明，「若在賽事期間發現播放國歌或升掛區旗出錯，須以「T」字手勢向主辦機構示意反對，情況嚴重時需要離場。」可以說，連煒楨打出「T」字手勢和之後的離場都是符合港協暨奧委會的指引。

堅拒糾正錯誤或違國安法

此前，筆者曾經就播錯國歌事件撰文，發現多次錯播事件發生後，海外體育賽事主辦方便紛紛以「無經驗」的實習生上網搜尋「香港」「國歌」，誤將谷歌搜尋結果置頂的黑暴歌曲當作「中國國歌」為藉口。果不其然，在這次事件發生後，亞洲健力聯盟隨即致函香港舉重健力總會道歉，也確認港隊有正確播放國歌檔案，並解釋「因技術團隊由不同國籍義工組成，未必認識中國國歌，事前在網上下載所有參賽隊伍國歌作後備，惟未有刪除錯誤版本，最終在頒獎禮上播放。」再一次以網上搜

索結果作為播錯中國國歌的原因。

一連串的播放錯誤國歌事件宛如踢責任的「皮球」，把一切「原罪」歸咎於了谷歌的搜索演算法上。當特區政府要求谷歌在用戶搜尋「香港」「國歌」時，將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置頂，卻遭到谷歌以搜尋結果為演算法為由，拒絕特區政府的要求。谷歌回應媒體查詢時稱：「從不會越過演算法自行決定一個網站或影片在搜尋結果的位置……為了維護公司提供最大限度的資訊存取的承諾，谷歌不會移除網絡搜尋結果」。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播錯國歌事件傷害了香港市民的感情，而谷歌百般推卻，以「搜尋結果按演算法得出，無法自行決定」為理由，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他強調，會就此事與谷歌繼續交涉，重申特區政府會用盡一切方法去糾正這些錯誤。

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則表示，特區政府已經向谷歌解釋相關歌曲是宣揚「港獨」，如果谷歌繼續堅持現時

做法，有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協助分裂國家」罪。

面對谷歌一臉「義正辭嚴」的說辭，以「演算法」的所謂「客觀理性」為理由來拒絕糾正錯誤搜尋結果，筆者不禁要問，谷歌拒絕糾正搜尋中國國歌的錯誤信息，是技術上的「不能」還是「人心」上的「不想」？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就此事件發表意見的時候，一針見血，認為要求谷歌提供關於中國國歌的正確信息，「我們知道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的，因為付錢賣廣告都可以將搜尋次序有所改動，谷歌是有方法移除不正確的資料。」無論谷歌搜索演算法如何「智能」，也是需要「人工」來搭建完善的。

拿「算法正義」作「擋箭牌」

谷歌明知有方法可以去提供正確信息，糾正搜索結果謬誤，尊重中國的國家民族尊嚴及感情，但它卻拿「算法正義」作「擋箭牌」，此番說辭不禁讓人懷疑，是不是

背後有人「居心叵測」，別有用意？用錢都可以買到搜索排序的前列，為什麼尊重他國的原則和底線的合理要求卻無法得到應有的回應？

谷歌作為一個西方主流的搜索引擎，提供正確的信息是作為大眾平台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明知正確答案，卻要顛倒黑白，置之不理，這是否是一種變相打着「香港牌」的挑釁中國的行為？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言，「互聯網企業有義務向大眾傳遞正確信息，而不是聽任錯誤信息傳播，誤導民眾。」更何況，這個「錯誤信息」還是隱含着「分裂國家」、「港獨」的犯罪元素，谷歌這種自詡客觀的「無奈」，難道不是一種「助紂為虐」的「行兇」之為？

無論谷歌的「演算法」是不是真正的「元兇」，但以「客觀理性」為藉口散播「港獨」信息，這恐怕背後的「主觀意志」是對中國抱有惡意和敵意吧！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